



以考古学为基础,全方位研究中国古代文明^{*}

——严文明先生聚落考古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韩建业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

本文题目取自严文明先生《以考古学为基础,全方位研究古代文明》一文,该文写于1999年北京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成立之际,加“中国”二字是为了突出先生的研究重点。

研究古代文明,需要以考古学为基础,结合文献记载,展开多学科全方位的综合研究。这是严文明先生对学术界的提示,也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这里的“以考古学为基础”,主要包括聚落考古和谱系研究两个方面:利用前者可以探究社会的复杂化,通过后者可以把握文化发展的大脉络。他发现中国各区域间频繁互动的社会复杂化过程,同时是“重瓣花朵式”的早期中国历史文化格局的形成过程,实际又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过程。用他的话说,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在于“逐渐从多元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格局”,这是中国文明之所以具有无穷活力和强大凝聚力,以至成为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得到连续发展的伟大文明的重要原因。这样一个从多元一体到多元一统的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理论,是他长期辛勤从事考古学研究的精华所在,也是中国考古学主流传统薪火相传的结晶。

在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文明起源研究盛况空前而理论创新显露窘境的今天,让我们重新品读先生有关论著,感受先生探究中国文明起源的心路历程,从中获取有益启示。

严文明先生关于聚落考古和文明起源研究的论著除少数在论文集中首次发表外,多数都是先发表于期刊,后分别收录在《仰韶文化研究》、《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史前考古论集》、《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长江文明的曙光》、《中华文明的始原》等论文集当中,总数30余篇,这还没有包括一些相关的书序、书评、访谈录、对谈录在内。这些论著的发表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延续至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虽然表达的学术思想基本一致,但认识越来越全面、深入、成熟。

第一个阶段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代表作有《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横阵墓地试析》、《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①、《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等^②。

关于前面两篇论文,笔者曾做过如下评述:

“1981年严文明和巩启明先生合写《姜寨早期的村落布局》一文,对临潼姜寨环壕聚落做了深入分析。认为该聚落房屋可分为5组,可能对应5个氏族,环壕外墓葬也与各组房屋有对应关系,整个聚落可能代表一个处于平等社会阶段的胞族。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形态研究虽然肇始于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但半坡遗址揭露不够完整,且发掘者未将早期聚落和中晚期遗存分别开来,结论当然大打折扣。姜寨聚落格局基本完整、年代相对单纯。严文明先生在分期的基础上,通过对遗迹间关系的细

*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

致分析,很好地把握了聚落内部布局特征,成为中国聚落考古研究的典范。以后关于姜寨聚落的研究还有不少,但基本结论并未和该文有多大不同。”“1986年发表的《横阵墓地试析》,首先分析华阴横阵墓地范围的完整性,其次进行墓葬的分期排序,再次是人口分析,最后是对该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的推测。结论认为当时处于平等社会阶段,横阵墓地的复式合葬墓和小合葬坑分别代表氏族和家族两级社会组织。该文是中国考古学界继《元君庙仰韶墓地》之后最重要的史前墓葬研究成果,其对墓地代表的人们集团人口数的推算更是富于开创性”^③。

在以上两个研究范例中,聚落形态研究都建立在细致的文化分期基础之上,十分注意聚落形态的同时性问题,因此能够取得可信的研究结果。这一点在现在的聚落考古实践中仍然值得重视。而对一个个单独的聚落或墓地反映的社会状况做恰当分析和把握,是宏观判断所属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早期社会发展程度和文明化过程的基础。

1984年发表的《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一文,综合各地铜器资料,明确提出仰韶文化晚期属于早期铜石并用时代,龙山时代属于晚期铜石并用时代。这表明中国和西亚等地一样,在青铜时代之前也存在铜石并用时代。虽然他在这篇论文中主要只讲铜器问题,但正如他后来论述的那样,实际从铜石并用时代开始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程度明显加剧,新的时代气息在很多方面都有所显露。这为他下一阶段全面论述中国文明起源埋下了伏笔。

在诸多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1986年严文明先生写成《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这是他多年来考古学研究的总结和升华,其影响之深远,在他所有论著中恐怕无出其右者。通过宏观梳理中国史前文化发展谱系,他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在具有多样性和不平衡性的同时,“还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式的格局”,也就是多元一统的格局。这一“分层次的向心的结构”,决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也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结合:文明因素虽多源,早期文明社会虽先后发生在多地,但“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决定了外界文化“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的民

族特性”;“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成为中国文明连续不断、分合过程中统一占据主流的主要原因,成为中国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认同感的根本所在。他还特别强调,这个格局的形成和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特点息息相关。

探究中国古代文明和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主流传统之一,李济、夏鼐、苏秉琦、张光直等著名考古学家也都对此各有建树。但面对这样一个庞大课题,人们难免有盲人摸象之感,因此难免生出许多重要分歧。比如有人以为中原史前文化始终具有中心地位,其他地区的文化只是其影响的结果;有人以为中原文化并无特殊之处,中原文明也不过是次生文明,等等。严文明先生辩证地揭示出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统”或者由“多元一体”向“多元一统”发展的格局,强调了中原的特殊历史地位,视野宏阔,让人顿有拨云见天之感。三年后的1989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利用民族学资料,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④,与严文明先生利用考古学、历史学资料得出的结论主旨相同。

可以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严文明先生通过聚落形态和文化谱系两个方面的研究,已经搭建起了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

二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前期。代表作是《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态研究》^⑤、《半坡类型的墓葬制度和社会制度》^⑥、《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⑦、《中国环境聚落的演变》^⑧、《龙山时代城址的初步研究》^⑨、《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⑩、《炎黄传说与炎黄文化》等^⑪。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原始社会晚期发展的理论,基本是母系—父系—奴隶社会这样的套路。在1985年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严文明先生明确指出母系—父系说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考古学中也难以找到确切证据,“考察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社会性质或社会发展阶段时,或者对原始社会进行分期时,应该首先考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而不要从世系出发”^⑫。《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态研究》和《半坡类型的墓葬制度和社会制度》二文正是从此思路出发,对仰韶文化聚落形态和墓葬制度研究的总结性著作。

笔者曾有如下评述：

“《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态研究》，由个案转入综合，将多年对仰韶文化聚落形态的研究集中展现出来。该文首先提出房屋和聚落形态研究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单个房屋的分类和每类房屋的结构和功能的考察；同一聚落中房屋的组合关系；聚落的总体布局及其功能的考察；聚落的分布和各个聚落之间的关系。然后照此逻辑顺序对仰韶文化的房屋和聚落形态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中既有对每个典型房屋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又有高屋建瓴式的归纳概括。结论认为仰韶文化前后期之间聚落形态发生了重要变革：前期聚落布局凝聚内向，内部存在明确划分，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都没有明显分化；后期不再内向，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明显分化，聚落群和中心聚落出现，显示开始迈开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掀起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而仰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是最为密切的’，严文明先生关于仰韶文化聚落形态、社会状况及其与文明起源关系的研究，也就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半坡类型的墓葬制度和社会制度》一文，聚焦于墓葬资料最为丰富、最具有代表性的半坡类型。论文首先对横阵、元君庙、史家、半坡、北首岭、姜寨一期等典型墓地进行个案分析，然后将半坡类型从埋葬制度角度分为4个区域，最后讨论其社会制度，得出不少精彩结论，比如半坡类型的生产劳动主要由男性承担，男女社会地位基本平等，不存在私有制观念，当时家族的作用尚不显著，属于氏族公社的高级阶段；半坡类型‘由于在文化传统上许多方面的一致性，它们很可能是一个大的亲属部落群’。尤其是关于曾经热烈讨论过的半坡类型的世系问题，不是简单倾向于母系或父系，而是充分讨论了其时间和空间上的复杂性”^②。

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学术界还沉浸在被十多年以来许多重要考古新发现唤起的兴奋当中，当大家还激烈地讨论何为文明、何为文明标志，还在为某些文化是否已经进入文明争论不休的时候，严文明先生选择了探索文明化的过程这条道路。他并未停留在“文明”这个概念本身，而是从系统分析聚落材料出发，首次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进行了全面考察，实际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基础和起源的过程进行了全面梳理，于1987年写成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一文。该文将中国新石器

时代聚落形态的演变过程分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早晚期五个发展阶段，指出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形态表现出凝聚、内向、封闭的特点，与较为平等的氏族社会对应，铜石并用时代早期聚落明显开始分化，中心聚落、专业性经济中心和宗教中心开始出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出现城乡对立，文明初步兴起。这篇论文不但确定了严文明先生以后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基调，而且对此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2年发表的《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主题直指文明起源，并结合上文发表后的许多新发现进行了论述，基本结论虽与上文近似，但考虑更加细密成熟。明确指出“无论从文化发展水平还是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公元前3500年左右都是一个重要的分界……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自然要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该文还提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大致相当于史书记载的五帝时代，考古学和古史传说相互对证，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1993年发表的《炎黄传说与炎黄文化》，专题讨论炎黄文化，推测炎黄时代社会分化刚开始，结论与上文一致。

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环壕聚落和城址地位特殊，越来越引人关注，关于其产生背景、功能和与文明化过程的关系等的讨论很是热烈，但多着眼于一城一地，或者对具体材料缺乏必要分析。严文明先生的《中国环壕聚落的演变》和《龙山时代城址的初步研究》二文，就是在具体分析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对这两类互有联系的重要聚落形态所作的综合研究。这两项研究实际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演变的主线，和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大致脉络。具体来说，前一篇综合论述了中国环壕聚落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的几个发展阶段，以及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逐渐向城邑过渡的过程，并指出环壕聚落主要分布在北方，并有从北向南发展的趋势。当然后来知道长江中游的澧县八十垱也有和兴隆洼文化差不多一样早的环壕聚落。后一篇综论龙山时代城址，将其分为内蒙古中南部、长江中游和黄河中下游3大群，指出城和周围的聚落构成统一的城乡性质的社会组织，城对乡的控制或统治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城址的大量出现，正对应所谓“天下万国”，其时当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阶段。

在研究方法上，后一文至少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一是对现有材料的可靠性进行客观分析，

同时充分考虑到考古发现的偶然性。比如环壕和城址都有较大面积,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全面揭露,通过局部迹象判定整体性质就可能出现失误,该文对每项材料都认真分析,保证了结论的真实可靠。又比如根据当时的发现,中原的城址比长江中游和内蒙古中南部的稍晚,该文指出这不能成为中原文化发展滞后的证据:中原的平粮台和孟庄古城虽不很大,但布局规整、建筑技术较高,“中原还有不少比他们大得多的遗址,很难说以后就不会发现规模更大、甚至年代更早的城址”。果然后来就有仰韶晚期阶段的郑州西山古城的发现,尤其是在他抱希望最大的陶寺遗址发现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城址!二是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城址的功能和性质,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比如对于内蒙古中南部的城址,他以为是有意建造的军事城堡,“无法肯定它是否是从一般聚落中分化出来凌驾于其他聚落之上的、具有中心聚落性质的城”。这和不少人一提到“城”就想到城乡差别和阶级分化的简单思路有很大不同。

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严文明先生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已经日趋完善和系统化,研究视野也更加广阔。

三

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代表作除前文所说《以考古学为基础,全方位研究古代文明》外,还有《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②、《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③、《东方文明的摇篮》^④、《中华文化的始原和早期发展》^⑤、《重建早期中国的历史》^⑥、《中国史前聚落的考古研究》^⑦、《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⑧、《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⑨、《炎黄传说的考古学观察》^⑩。

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大陆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存在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顺序的发展“规律”,但正如严文明先生先前所说,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这样的顺序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实际上,典型西方式的奴隶社会在中国并未存在过,而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竟有“西周封建说”和“战国封建说”那样大的学术歧见,可见用“封建社会”来概括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也只是一厢情愿。《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综论了黄河流域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程,强调了其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越来越突出的中心地位,特别是还结合古史记

载,提出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三大阶段:古国—王国—帝国。这样的国家发展模式,密切结合中国古史的实际,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及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有重要意义。

随着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不少人意识到长江流域在文明进程中也有重要位置,有人甚至提出“长江文明”,以与所谓“黄河文明”对应。《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长江流域文明起源存在上中下游三个中心,这些中心同黄河流域有着密切联系,“显然不能把长江和黄河在文化上分割开来,提出什么长江文明或者黄河文明那样的概念”。该文还指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中处于核心和关键地位,在瓷器、丝绸、玉器、漆器等典型中国文化元素方面更有其特殊贡献,而精耕细作的稻作农业应当是手工业发达的长江流域文明形成的基础。

现在的确到从全球角度看中国文明的时候了!《东方文明的摇篮》一文从整体上论述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作为东方文明摇篮的自然地理条件、农业基础、发展历程,认为“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最主要的是两极,即以西亚两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和以东亚两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东方文明”。东亚“两河流域”的庞大体量和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格局,是一种饱受外来冲击而能保持连续性的富有弹性的“超稳定结构”,而西亚的两河流域既狭小,所派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在地理上又相对分离,无法形成统一的整体,因而“经不起外来势力的冲击,一个个都像流星似的消失了”。

《中华文明的始原和早期发展》结合考古学和文献资料,综合论述了中华文明发生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文献所显示的传说时代的文明曙光,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夏商周三代的辉煌发展。《重建早期中国的历史》一文提出“早期中国”这个重要概念,其时间界定在“从祖国大地上出现国家组织算起,到历史记载比较明确的商代晚期之前为止”。综合论述了中国传统的古史系统及其疑辩,考古学和文献结合重建夏商历史和古国历史的主要内容。特别强调了考古学在重建早期中国历史和文明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炎黄传说的考古学观察》则提出了“黄帝则是文明起源或所谓城市革命的先行者”这样的认识。

《中国史前聚落的考古研究》和《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分别对20世纪为止的中国史前聚

落和文明起源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特别强调了中国古代文明内容异常丰富,需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研究的重要性。其主旨和《以考古学为基础,全方位研究古代文明》一文表达的思想相同。其中《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提出从公元前4000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开始,一些发达的文化中心已经迈开了走向文明的步伐,这是与以前稍有不同的地方。

严文明先生关于聚落考古和文明起源研究的成功实践,首先得益于正确的研究方法,几乎每篇论文都渗透着辩证思维,都逻辑严密、环环相扣。不过他专门讨论方法论的著作并不多见,《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一文就显得弥足珍贵。该文回顾了中国聚落考古的发展历程,认为聚落考古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单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研究、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并论述每项内容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指出“不能把考古调查中发现的一个个遗址直接看成一个个聚落遗址”,因为一个遗址可能包含几个不同聚落,但“只要基本的格局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还是应当作为一个聚落遗址来对待”。强调要用聚落考古的观念去思考和组织田野考古工作,这样需要设计新的作业方式,对田野考古的要求比过去提高不少。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通过他倡导的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严文明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更加全面和成熟。我们相信,这些经实践检验而历久弥新的方法论和理论,必将对今后中国的聚落考古和古代文明研究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注释:

严文明:《以考古学为基础,全方位研究古代文明》,《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1期,1999年。后收入《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

③⑩ 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年第10期。后收入《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

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严文明:《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

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严文明:《长江文明的曙光》,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②⑨、③② 严文明:《中华文明的始原》,文物出版社,2011年拟出版。

巩启明、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后收入《仰韶

文化研究》。

严文明:《横阵墓地试析》,《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后收入《仰韶文化研究》。

⑪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后收入《史前考古论集》。

⑫ 这是严文明先生参加1986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尔莱召开的“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发表于《文物》1987年第3期。后收入《史前考古论集》。

⑬、⑭ 韩建业:《重读〈仰韶文化研究〉——严文明先生仰韶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南方文物》2009年第3期。

⑮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⑯ 严文明:《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态研究》,《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⑰ 严文明:《半坡类型的墓葬制度和社会制度》,《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⑱ 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后收入《史前考古论集》。

⑲ 严文明:《中国环壕聚落的演变》,《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后收入《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

⑳ 严文明:《龙山时代城址的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编辑委员会,1997年。后收入《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

㉑ 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后收入《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

㉒ 严文明:《炎黄传说与炎黄文化》,《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后收入《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

㉓ 严文明:《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仰韶文化研究》,第348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㉔ 严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㉕ 严文明:《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后收入《长江文明的曙光》。

㉖ 严文明:《东方文明的摇篮》,《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㉗ 严文明:《中华文明的始原和早期发展》,《国学研究》第12卷,2003年。后收入《中华文明的始原》。

㉘ 该文有两个版本,简本发表在《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一书中(《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文物出版社,2009年),繁体则收录在《中华文明的始原》。

㉙ 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文物》1997年第6期。后收入《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

(责任编辑:周广明)